

主编

宋茂盛

马龙溪

张道华

副主编

曹玉珍

毛泽东十篇哲学著作学习指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十篇哲学著作学习指南

主 编 宋茂盛 马龙溪 张道华

副主编 曹玉珍

山东大学出版社

前言

1989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全党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上讲：

“党中央要求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学习哲学应重点学好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学好邓小平等同志老一辈革命家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根据这个精神，1990年定为“全国哲学年”，全国的干部都要学习毛泽东等同志的哲学著作。

为了迎接“全国哲学年”，我们从高干读书班规定的学习书目中选出毛泽东的十篇重要哲学著作，编了这本《学习指南》，进行辅导。本书有如下特点：（1）全面地、系统地辅导每一篇著作。由于辅导的这十篇著作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所以只要抓住了它们的基本思想，也就基本上把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2）本书特选入毛泽东的《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和《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两篇原文，并进行辅导，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新的方面和角度学好毛泽东的哲学思想。（3）增加了军事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为了强化军事意识，特选入了毛泽东的两篇充满了哲学思想的军事著作进行辅导。在编书时，力求既照顾到毛泽东在军事科学方面的论述，又侧重从哲学的角度挖掘出它们的军事唯物主义和军事辩证法的思想。这对于增加军事科学知识、强化军事意识和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知识面，是有益的。（4）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细致的辅导。对所选的每一篇著作分为“写作背景”、“学习要点”和“注释”三个方面进行解说，力求全面、系统、准确，通俗易懂，忠于原文。在编写每一篇的“学习要点”时，不仅照顾到它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且突出了重点。在每一篇的“注释”中，对本篇的“名词”、“典故”和“难句”作了详细的解释，具有知识性、明晰性和故事性。

本书是干部、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大学生自学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辅导读物，借助于它能够学懂和掌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本书的主编是：宋茂盛、马龙溪、张道华，副主编是：曹玉珍。参加编写本书的同志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龙溪、王荣江、车美萍、刘玉平、刘善华、刘明芝、宋茂盛、张道华、郑凤琴、曹玉珍。

马龙溪、张道华、曹玉珍等同志统了一部分书稿。最后，全书由宋茂盛同志统改定稿。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编 者

1990年3月

孙立群
郭京江 《共和国百大元勋风采》(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胡耀邦》(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万里》(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李先念》(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习仲勋》(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华国锋》(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薄一波》(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万里、胡耀邦》(解放军出版社)
王永志 《孙立群与万里、胡耀邦》(解放军出版社)

毛泽东十篇哲学著作学习指南

主编 宋茂盛 马龙溪 张道华

副主编 曹玉珍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水利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10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ISBN7-5607-0359-3/B·30

定价：4.50元

前 言

第一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1)
第二篇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66)
第三篇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	(140)
第四篇	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一九三七年九月）	(213)
第五篇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	(239)
第六篇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一九四一年）	(306)
第七篇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	(324)
第八篇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	(337)
第九篇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	(394)
第十篇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	(427)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篇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写作背景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当时曾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理论，着重从军事上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军事专著，而且也是一篇关于军事方面的光辉的哲学理论著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为蒋介石的血腥屠杀所屈服，于1927年8月1日领导并组织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革命战争已成为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斗争。我们面对着异常强大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则变成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掌握着经过改造了的、拥有精良的武器和物资供应的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相比之下，红军则处于幼年时期，十分弱小。红军及革命根据地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经

常遭到他们的“围剿”。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是当时客观形势的主要特点。

那么，我们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呢？在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并开展了几场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在红军创建时期同开始于1927年11月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斗争；第二次发生在1930年6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反对主张红军去攻打大城市，企图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军事冒险主义；第三次主要是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这一次的“左”倾比前两次错误更为严重。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从组织上取得了领导权，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他们根本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机械地搬用苏联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其结果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惨重损失，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1935年1月，我党召开的遵义会议才使王明错误路线得以纠正。第四次大论争发生在长征途中，主要是反对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总之，这几次大论战的焦点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战略原则问题，实质是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1935年底，红军到达陕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始了新的局面。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艰辛历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个总结包括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两个方面。关于前者，毛泽东在1935年12月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演中已经

完成。“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0页。以下引文凡出自本书，只注页码）。

这部著作直接讲的是军事问题，但却包含着十分深刻和丰富的哲学思想，它是在军事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典范。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成功地把唯物辩证的世界观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从正反两个方面深刻地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具体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正确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剖析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错误根源。

这部著作发表于抗日战争前夕，这就为全党全军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本书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是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纲领性著作。后来相继发表的一系列军事论著，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可以看作是这篇著作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军事思想的进一步补充和发挥。从世界观的角度看，这篇著作又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先导，“两论”的基本思想和许多基本原理在此著作中都已经提出来了。因此，这篇著作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天，我们重新学习这篇著作，要着重领会毛泽东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对于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我们搞好自己的各项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学习要点

1. 依据战争规律引申出战争指导规律

毛泽东在研究和指导战争时，首先从研究战争规律入手，肯定了战争既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也存在着战争指导规律，并正确处理了二者的关系。

关于战争是否存在着客观规律，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曾作过很不相同的回答。毛泽东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第458页）。“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第165～166页）。这就是说，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的形式之一，象自然界和其他社会领域的事务运动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尽管战争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有许多表面现象和偶然性的东西，但现象之中隐藏着本质，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在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存在战争的客观规律。战争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战争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内在本质联系，具有客观性、稳定性、必然性、普遍性等特点。

毛泽东不仅肯定战争存在着客观规律，而且认为人们可以认识战争规律。认识战争规律是对战争进行正确指导、争

取胜利的基础。他说过，不懂得战争的情况，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人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战争过程的各方面、各阶段、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并加以抽象概括，得出一些本质性的概念，然后再找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可认识战争规律。

毛泽东在肯定战争存在着客观规律的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他说，“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第167页）。战争指导规律是战争指导者基于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所制定的战争指导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他提出这一观点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认识战争的目的，在于指导我们正确地实行战争。正如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在于拿了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说：“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第162页）。只有依据战争规律制定出指导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原则，方能战胜敌人。我们承认战争规律的客观存在及其可知性，就应当承认战争指导规律的存在。后者是人们对前者的认识和自觉利用，是前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的内客与前者相一致都是客观的，两者的关系同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关系相类似。

从毛泽东论述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之间的关系来看，战争规律决定着战争指导规律，有什么样的战争规律，在它被正确反映的条件下，就有什么样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作战形式、方法。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都是由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和根本规律规定的。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有四个特点，即经历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四个特点决定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即红军可能发展和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地发展和战胜其敌人，如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红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就是由此产生的。一方面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过大，且短期内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就决定了我们在战略上只能采取持久的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开始只能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而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在作战方式上基本是运动战；在兵力使用上只能集中兵力，“实行一个拳头打人”，等等。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顺利条件，我们可以在战役和战斗中实行外线速决进攻的方针，能够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正如毛泽东所说：“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第175页）。

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不仅决定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也规定着当时战争的主要形式。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此外，战争规律也决定着具体的作战形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为了避免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和敌人实行决战，就应该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针，就应该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等等。

2. 在战争的一般规律指导下，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叫“如何研究战

争”，毛泽东首先从战争的一般情况讲起，从四个方面作出了回答。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研究、指导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作为哲学原理与军事科学的中介层次的科学方法。在战争的一般规律指导下，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之一。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第155页）。这就告诉我们，既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更要着重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要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个一般与特殊或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方法，应当成为研究战争问题的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即事物）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即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战争这个矛盾统一体也是如此，既有一般规律，又有特殊规律，两者是相互联结，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一般战争的规律存在于特殊的战争规律之中，特殊的战争规律又受一般战争规律制约。

在毛泽东看来，研究战争首先应当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这篇著作一开头就指出：“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第154页）。又说，“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第155页）。研究一般战争规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在于战争的一般规律所揭示的是战争这个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正是这些共性的东西规定了战争的一般发展方向和趋势，规定了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为战争参与者提供

了一般的指南和预见。如果不懂得战争的一般规律，就不可能遵循正确的方向深入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就会在战争实践中迷失方向，陷入盲目被动的境地。

毛泽东除了讲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外，更加重视研究特殊的战争规律。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第155页）。他针对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特别要求全党全军研究战争规律时应结合中国战争实际，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因为每次战争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都有各自的特点，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一般战争的规律只能包括特殊战争规律的部分内容，而不能包括其全部内容。也就是说，特殊的战争规律不能完全进入到一般的战争规律之中。如果只停留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上，就不可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战争问题。如果用一般战争规律代替特殊的战争规律，认为只要按照前人军事著作中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来指导战争就行了，那就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同时，一般战争规律所具有的普遍意义也只是相对的，它还要在战争实践中接受检验和修正补充，还要通过研究许多特殊的战争规律，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使它得到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各种战争的情况不同，有着不同的战争规律，从而决定着很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性质之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战争，各有

其特殊性。这些都是研究和指导战争时应特别注意的。

从时间条件上看，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自的特点。不仅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大阶段上战争有其特点，而且同一国家同一历史时期的各小阶段也各有其特点。这就决定了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将一种模式呆板地套用到不同的阶段上。

从地域条件上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一些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套用。

从战争的性质上看，有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之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它们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也不能呆板地互相套用。

因此，“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第157页）。

毛泽东在分析战争规律的特殊性时，特别反对僵化的思想观点，他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第157～158页）。这就把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贯穿于战争的研究之中。

着眼于事物的特点和发展来研究事物的特殊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3. 以阶级观点为基础的战争观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本质的根本看法，它主要回答战争

是什么和对战争应该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观察战争，从人类社会整体的有机联系中去研究战争。他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从纵的方面看，它有产生、发展、消灭的历史过程，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偶然现象，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性质的战争，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有着最强烈的阶级性，战争总是一定阶级政治的继续；从横的方面看，它和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现象都有着必然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这就科学地解决了在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对待战争的问题，形成了唯物辩证的战争观，亦即以阶级观点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战争观。

第一，关于战争的起源和本质。

毛泽东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第155页）。这就给战争下了一个完整、科学的定义。

这个定义说明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战争这个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以后才产生的；战争也不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它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有私有制就永远有战争，有对抗的阶级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他在另一部著作中也说到：“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第442页）。这说明战

争不仅随着阶级的出现而出现，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尽管它的形式多种多样，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残酷，但是隐藏在战争背后的根源却始终没有变，那就是私有制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战争的实质。

这一定义还阐明了战争的特殊本质，揭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的一般形式，而是阶级斗争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最高形式。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时时存在，阶级斗争必然采取一切可能的形式进行着，但并不会时时发生战争。只有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的程度，不能采取通常的形式加以解决的时候，便要动用武力，采取战争这种最高形式，以扫除敌对双方在政治上发展的障碍。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战争无非是政治意图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论》第1卷，第437~439页）。这一观点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进一步发挥和系统阐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总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是政治斗争的特殊手段——暴力手段。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另外，毛泽东在这一定义中还全面地概括了战争的四种情况。这就是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它们的起源和本质是一致的。

第二，关于战争的性质和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

毛泽东在本书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第158页）。在另一篇著作《论持久战》中，他进一步指出：